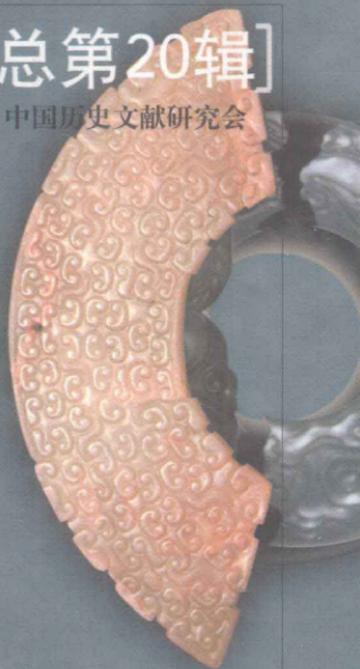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20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LSW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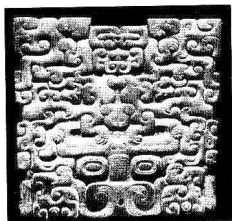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20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LSWXYJ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20 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7

ISBN 7-5622-2439-0/K. 141

I. 历… II. 中… III. ①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558 号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20 辑)

© 周国林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8787624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 李晓明

封面设计: 甘英

责任校对: 赵庆伟

督印: 方汉江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85 千字

版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7.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吉辰先生：

——新将一年，还希^{同起}子承，敬表——。
——承借嘉陵区的所程程，益倍多珍兄兄，
——心算，天已，有失倒，徒之迎，敬仍如之。

余书：晴山堂石刻碑帖，古学，自古道
来。但此名称似有未妥，碑与帖不同，
行书能之通用，但其称谓名称有区别。
碑是竖的，往之至于朝宇故整前的。帖是
横的，嵌置幅润者，又称法帖。

记得它昔原名，又托^{上图}古聘组因志查之
历史文献碑帖目录即知道，为查书费事，
是书即称《晴山堂法帖》，或称《晴山堂石刻
拓本》，最好用原名称，曾意然否？便也示发。
顾廷龙上 4月24日晚

电文 93.17 (484)

顾廷龙先生论碑帖之别

（此件是顾廷龙先生于1995年4月24日晚给本会常务理事顾吉辰教授的信。遵顾先生之嘱，《晴山堂石刻碑帖》改名为《晴山堂法帖》出版。江泽民主席视察江阴时，江阴市领导同志赠以此书，得到江主席称道。）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瑞明 邓瑞全 朱仲玉 来可泓 李叔毅 李晓明
杨 昶 周少川 周国林 崔曙庭 戴南海

主 编 周国林

常务编委 王瑞明

编委会通讯处:

邮 编:430079

地 址: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电 话:(027)87673308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20 辑)

目 录

论古籍整理的重大意义	邓广铭遗著 (1)
刘恕与《通鉴》	陈乐素遗著 (4)
邓广铭先生四写王安石的意义	王瑞明 (14)
论范仲淹薄道尊儒的治国思想	郭伟川 (23)
《河南程氏正宗谱》论略	罗家祥 (37)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朝民间争讼的缘起	雷家宏 (47)
宋代花卉史书目文献考议	张全明 (57)
九域图志局考实	陈蔚松 (70)
略论南宋之官府校勘	汝企和 (75)
关于《周礼》的几个问题	吕友仁 (84)
灾异辨析	
——兼及《公羊传》和董仲舒之灾异说	陈业新 (94)
郑玄的《尚书》学	耿天勤 (104)
汉魏之际襄阳人文环境之考察	徐 华 (117)
魏晋南北朝语言风俗杂谈	张承宗 魏向东 (128)
“借诗以存史”说发微	郝润华 (143)
《永乐大典》与大典本永乐志	张 升 (152)
论滇、黔、桂、粤文化世家所形成的多元文化景观	张新民 (167)

漕运研究文献材料述论·····	吴 琦(178)
傅山和他的《两汉书姓名韵》·····	顾志华(184)
阎若璩与伪《古文尚书》的考辨·····	杨绪敏(189)
《五礼通考》浅论·····	王炜民(200)
戴震的训诂方法及其思想体系的建立·····	王记录(215)
略论杨守敬日本访书·····	李春光(230)
饶钦农先生学术成就概述·····	赖玉芹(237)
《山海经》研究五十年述评·····	胡远鹏(246)
汉代文献整理的主要成就·····	姚伟钧(258)
“卫懿公好鹤”辨·····	陈维礼(266)
大兴安岭北魏石室祝文与《魏书》有关史料的比较研究 ·····	栗继生(271)
《宋书》纪传疑年录新编·····	许福谦(279)
《帝王略论》与唐代史学·····	陈 虎(289)
王维诗评解志疑·····	陈增杰(299)
唐玄宗《道德经注疏》特点简析·····	董恩林(308)
高士奇和他的《扈从东巡日录》·····	王同策(322)
论清代《起居注册》及其文献价值·····	漆永祥(329)
《续资治通鉴》西夏史事点校疑误·····	刘正平(343)
陈宏谋及其家书·····	张俊杰(349)

论古籍整理的重大意义

邓广铭遗著

[编者按] 邓广铭先生这份手写稿是其女儿邓小南教授提供。原稿无题,题目为编者所加。我们将这份手写稿与《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 33 期(1992 年 2 月)发表的邓先生《谈古籍整理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进行比较对照,发现有同有异,手写稿可能写在 1992 年初,是为出席一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但发言时并未照念,有所取舍,有所补充,有所发挥,这恐怕是两者发生差异的原因。手写稿强调古籍整理的世界意义,特别值得重视。

今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负荷的,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是要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样的一个新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工农业和文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所以,这便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全国的青年,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社会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的要求。

但具体到我们这个群体目前所承担的整理古籍这项工作来说,与我们上面所提出的要实现现代化、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否能协调一致呢?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必须给予肯定的答复的。我们必须承认,在 15 世纪以前[或许在明朝建立其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1368 年)以前],中国的文化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其以中国全部文化历史为背景而写成的一部

中国科技史中,对中国 15 世纪以前的一些创造发明对全人类的贡献,就作出了很高的评估。而在我国驻英使馆为他的这部巨著出版的庆祝会上,他和他的同事更说,欧洲现代的科技文化,导源于中国古代的创造发明的在一半以上。而李约瑟所谈到的,还并不包括我先民在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方面的伟大成果在内。而这些方面的成果,对全世界精神文明的贡献,也同样是不能低估的。不论上述的属于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的创造发明和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以文献资料(包括近代地下出土的甲骨、钟鼎彝器、秦汉简牍)为其载体而流传给我们。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部分固是吸收外来的东西熔铸而成,但有很大的一部分却是凭藉我国古代的创造发明加以推陈出新而造成的。因此,我们整理它,了解它,筛选它,把其中的精华部分加以系统化,使之成为我国人民文化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岂不是极为必须的吗?

任何民族在文化方面做出的任何贡献,全都是对于全人类的贡献。我们整理古籍的工作,当然是为了弘扬中国的文化,但弘扬以后却必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试看,我们的《孙子兵法》不是已经在全世界发挥了作用吗?而其影响所及,还不只限于军事方面。我们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是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的管理经营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吗?一部《楚辞》,经我们整理宣扬之后,已成为一部世界名著,其主要作家屈原已被推选为世界文学伟人之一。这都可证明,我们为了弘扬中国文化而从事的这整理古籍的工作,其本身就具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且是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的。

整理古籍的工作既具有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我们自应当严肃认真地从事这一工作。应当说,自从我们这个“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凡经我会组织的或邀请的或委托的个人或集体所校点、整理、翻译的古籍,基本上是没有出现问题

的(有的是经本会组织了专家进行审查的,质量更有了保证)。但有一些不是在本会出书的计划之内,或者为了应付某种临时的任务(例如纪念某一历史人物而印行其论著),或者由一些以赚取稿费为目的,或是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的一些出版社的少数德才水平两俱不高的编辑,以及与这类编辑有个人关系的哥儿们却混进了整理古籍的行列,他们制造了不少恶劣成品,败坏了古籍整理的风气,贻笑于读者,也遗误于读者。举例来说,范仲淹为苏州人,其后人有海外华侨,捐了一些钱,前几年开过一次纪念会,出了一本范仲淹史料新编,印刷很讲究,其中所收文字却标点得乱七八糟,既对不起范仲淹,也对不起捐款的范氏后裔,更对不起买此书的读者。

(最后)的三项告诫:1. 不要使某一古籍因校点而受到损害;2. 不要使读者因读此校点本而受到误害;3. 不要使自己的学术前途因校点此书而被断送。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并不都能起把关作用,其本人的作品必须由外人进行审查,总编应严格把关。恶劣校点本应照伪劣商品一样,使之曝光。

刘恕与《通鉴》

陈乐素^遗著

《资治通鉴》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奉命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当时的官守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有给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他考虑到过去纪传体的正史,文字繁多,一般读书人已经很难全部读遍,何况皇帝日理万机,更少读史时间来了解古代的政治得失。于是他立意仿照《春秋》三传的体例,写一部编年史,包括战国到五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以备皇帝阅读。计划除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凡帝王所应知道的都写上去。这样,皇帝可以不费太多时间而得到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此目的,他先就写成《通志》八卷,记载战国时秦的史事。《通志》送呈英宗皇帝看了以后,很感兴趣,要他继续写下去,于是下了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的诏令,并且让他自辟官属,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从事写作,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图书供参考。这样,写作的条件是具备了,但以一个人的力量,是决不能完成这一繁重任务的。他首先便提请以和川县令刘恕做他的助手,说刘恕精通史学。这个意见得到英宗同意,于是刘恕就从和川调至京师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8 载此事作翁源令是错的)。随后又增加太常博士刘攽同编修,他也是当时一位有名的

史学家。

开局编修才几个月，英宗病发，第二年，治平四年（1067）正月逝世，由 20 岁的神宗继位。当年十月，开始召侍臣讲读经史，并把司马光主编的书，赐名为《资治通鉴》，神宗亲自写了序文，表示对这部书的重视。他所写的序文中有“勒成二百九十四卷”的话。但此时编写工作的进行只经过几个月，怎么就能先断定勒成 294 卷？据后来全书写成，分卷是：周纪 5，秦 3，汉 60，魏 10，晋 40，宋 16，齐 10，梁 22，陈 10，隋 8，唐 81，后梁 6，后唐 8，后晋 6，后汉 4，后周 5，合起来正好是 294 卷。这是经过 19 年的实践定下来的，怎么能在开始就把卷数安排准确呢？这不能不说是个疑问。

编修工作是一开始就紧张地进行的。协同编修的人员，除二刘外，到熙宁三年（1070）还增加了龙水县令范祖禹。编写的程序是，各自按时代先定事目，按事目的要求，广泛收集各种史料，写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删定。在编写过程中，司马光总是虚心地和同事们商榷并耐心地指导他们的。他曾给范祖禹写信说：“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千万切祷切祷。”^①这是为要在删定时有丰富的材料可供选择，以保证历史的真实性与记载的准确性。由于司马光的善于领导这工作和同事们的通力合作，所以能写成这样一部享有盛誉的名著。在元丰七年（1089）的《进通鉴表》上，司马光写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一句真挚的话。而在神宗来说，也确实重视这部著作，就在赐序文的当天，司马光便进读“三家为诸侯”一段；第二年，熙宁元年（1068），接着二年，三年都曾继续进读其他新写成部分。到熙宁四年（1071），让司马光设局在洛阳专心从事写作十多年，不兼他职，直到全书的写成。

友 谊

司马光受命修史，对于助手的人选，首先提举刘恕，这不但因

为他精于史学,而且彼此是旧交。论年龄,司马光生于天禧三年(1019)比刘恕(生于明道元年,即1032)长十三岁,在封建社会里,应该说是忘年之交。早在皇祐元年(1049年),刘恕十八岁时,参加礼部的考试。当时司马光是贡院属官,考官赵师民,问《春秋》《礼记》。刘恕答案精详,擢第一。司马光由此爱重他,他也就以司马光为师。在和川任内,彼此经常书信往来。嘉祐年间,即在治平修书之前,司马光早就有信和刘恕商量,认为春秋以后,一千多年,正史《史记》到《五代史》,一共有一千五百卷,士子长年读不完,也就不能说出大概,长此下去,史学恐怕会绝灭。因此他打算写一部编年史,从战国到五代为止。刘恕很赞成他的计划。这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治平之前,司马光已有写编年史的计划,而写书的目的,是面向一般士子,还不是帝王;供帝王“资治”,乃是后来的事。而且他们的商议,还在未受命写《通鉴》,未推荐刘恕同修之前,可知那时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治平三年以后,在京师崇文院书局内修书,他们,包括刘敞在一起工作,彼此的友谊更深了。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参政,创设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王安石也是爱重刘恕的,邀他参加条例司工作。他推辞说,不懂理财,而且反对王安石以理财为先。不久,御史中丞吕海因论奏王安石被罢,刘恕劝王安石停止新法中“不合众心”的作法。两人政见不同,从此绝交。第二年,司马光也因和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修书局便缺了主持人。刘恕也不安于留在京师,熙宁四年便以养亲为理由,请求调监南康军(今星子县)酒税,因为他父亲隐居不仕,住在庐山下,家境贫寒。熙宁四年,司马光调判西京御史台留司,奏迁书局于洛阳,刘恕在南康军许邕隶书局,继续修书工作。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多起来了。其中一次《与刘道原恕书》^②,一开始,司马光很客气,称:“光再拜”,然后商谈修南北朝通鉴。他欣赏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写得好,但可惜未作“志”,希望刘恕写完五代长编之后,就着手把沈约

《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中的志，存录其中的律历、礼乐、职官、地理、食货、刑法等的大要，编成一书，以补李延寿书之不足。但后来此事未见实行，这可能是刘恕对李延寿的南北史有不同看法，说他的书“言词卑弱，义例烦杂”^③，因而未考虑作志。但他们经常书信往还，研讨史学（下文另有论述），不因年龄、地理的差距，而有所疏远，足见情谊之深。

刘恕在南康军家中养亲，并不废止“长编”的写作。由于过劳，身体渐弱，但为了工作，在熙宁八九年，间，奏请朝廷，亲往洛阳和司马光商议修书事，不远千里，水陆兼行到洛阳，见到司马光。在讨论史事过程中，谈及自己身体疲累，必病且死，此后怕不能再相见了；大大触发了师友的伤感。他南归未到家，便遭母丧，突发的不幸事故，使他的健康更坏，不久便患了偏瘫病，右手足丧失了活动机能。但他在痛苦呻吟稍止的时候仍然不废修书。如此一年多，成了《通鉴外记》十卷，是口授儿子羲仲写的。书成不久，元丰元年（1078）就离世了，年仅四十七。临终，嘱咐儿子请老师司马光撰墓铭和为《十国纪年》作序。司马光在悲痛之余，仅能写成《十国纪年序》，叙述了刘恕的生平美德，以此代替墓铭。

刘恕之死，不仅司马光写《十国纪年序》代替了墓铭，而且同编修的范祖禹也写了墓碣^④，碣文说到“道原终身不治他事，独以史学高一时。”他死后，老父凝之以司马光的《十国纪年序》作为铭，埋于墓穴，又把范祖禹的文碣放在墓上，以作纪念。后来，黄庭坚虽然是元祐元年（1086）才参加《通鉴》校正工作的，不曾和刘恕同事，但仍然应刘恕儿子羲仲之请，在迁葬刘恕墓时，再为刘恕写了墓志铭^⑤。

苏轼、苏辙兄弟，虽然不曾参与《通鉴》的编修工作，但在京师时都与刘恕交友。熙宁四年刘恕南归养亲，苏轼作了长句《送刘道原归觐南康》^⑥，有“高节万仞凌首阳”之句，并同情他与王安石异议。刘恕南归后，与他们还时有唱和^⑦。苏辙《栾城集》卷3，也有

《送刘道原学士归南康》诗，句云：“三年一语未尝屈，拟学文章惊当涂”，也是指他对王安石的。元丰二年（1079），苏辙因事谪监筠州酒税。筠州就是刘恕的家乡。当年，他父亲刘涣因病自庐山回到筠州，九月去世。苏辙初贬筠州时，还曾见到刘涣。刘涣死后，他的二儿子名格的请苏辙为文纪念。苏辙因为与刘恕为友，又及见到他的老父，便应刘格之请，写了《刘凝之屯田哀辞》，并有序。我们借此略知刘涣的事迹。哀辞中提到：“凝之始以刚直不容于世俗，弃官归老于庐山二十年”，又说：“凝之隐居绝俗三十余年，神益强，气益坚，尽其天年，物莫能伤”。又论刘恕“博学强识”，“公（司马光）以直名当世，而君尤甚；虽公亦严惮之”。

刘涣，《宋史》无传，但卷444《刘恕传》开头曾说：“父涣，字凝之，为颍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以寿终”。欧阳修写的《庐山高》，载《居士集》卷五，题为《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末句：“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诗写于皇祐三年（1051）。以《宋史·刘恕传》中所说“时年五十”推算，则刘涣是生于咸平五年（1002），卒于元丰三年（1080），为七十九岁，所以《宋史》说他“以寿终”。刘恕死时，他已经七十七岁了；老年眼见儿子先死，自难免倍觉感伤。

刘恕死于元丰元年，七年后《通鉴》书成。书成后两年，即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写了一篇恳切真挚的奏文《乞官刘恕一子》^⑧，他说：“臣伏覩秘书少监刘攽等奏，故秘书监丞刘恕同修《资治通鉴》，功力最多，比及书成，编修官皆蒙甄录，惟恕身亡，其家独未霑恩，子孙并无人食禄，乞依黄鑑、梅尧臣例，官其一子！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奏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篇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以众共推先，以为功力最

多。”“欲乞如敝等所奏”，“除一子宫，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为虚设！”

除刘敞、司马光外，还有范祖禹《乞赐故修书官〈资治通鉴〉札子》^⑨，请“下国子监印造《资治通鉴》并《目录》《考异》二部，赐其家子孙！”这就是说，修书的同僚都有同样的心情，深切怀念他们的亡友。

思想、性格与行为

苏辙说，刘涣以刚直不容于世俗；司马光说，刘恕耿介不容于人^⑩；范祖禹说，“道原为人刚毅，一毫不挫于人”（《墓碣》）。刘恕有父风，而更强烈。司马光说他“面刺介甫，至面色如铁”；但又说他“见质厚者亲之如兄弟，奸谄者嫉之如仇”^⑪。他有“如仇”“如兄弟”两个方面；就是对王安石，也只是政见不同的争论，如司马光所说“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并不是一概否定，疾之如仇。他年未五十而死，主要恐怕是由于过度的脑力劳动所致。《十国纪年序》中说他“嗜学，方其读书，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还有一个故事：宋敏求家富藏书，刘恕特地去借读。宋敏求尽东道主之谊，每天供应酒饌。他说，我是为借读图书而来，不是为酒饌，请一切从简，让我闭户多些时间能够专心致志阅读。于是日夜不停地且读且抄，用十日的功夫把需要的资料看完抄完，告别回去。但眼病产生了，视力大大减退了。司马光说：“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耶！”

还有一个故事：刘恕家虽穷，但他从来不肯随便收受别人的东西。那年他从家乡远道到洛阳去见司马光，请教有关修书的事，住了几个月，已是十月初冬，告别回家。司马光送他几件衣袜和旧貂褥，以免路上遭寒。他不肯收受。司马光以师友之谊强他接受了。走到颍州（阜阳），离家乡还远，他就把所有赠物全部包装好，托人送回洛阳。看来，司马光对此也未必高兴吧，虽然对他的为人还是